

火笑,即使是在乡村,这样的说法现在也很少见了。炉火烧得正旺,忽然往外一蹿,发出呼呼的声音来,这就是火笑。在十几年前,乡村里电话不通,隔着茫茫的苍山,要通个消息,很是方便。炉火一笑,则意味着可能有客人要来了。如今想起,这种近乎天真的“神启”,有时也有准确的时候。我们清晰地记得,有一天我们家的炉火笑了,母亲跟我们讲,有客人要来了。临近中午,果然见大路上,舅舅骑着自行车来了。长久不见的亲人,忽而相见,场面很是欢喜。所以,故人具鸡黍,真是平静生活中最大的惊喜。

农村人事灶王爷,信仰里保存着淳朴的情感,过年过节也少不了灶王爷。故而,火笑,其实是可理解为灶王爷在笑。炉火旺盛,当然是要做好酒好菜。平日里,农村人的吃饭都是随便扒一口,能吃

饱就行,饭菜也是,随便几根柴火就能煮熟。所以,炉火是个象征,烧不旺,人气便不足。乡村里人家隔得远,山脚是一家,山腰是另外一家,这也是常见的事情。乡村生活的单调,就在这空旷而寂寥的山野之间。所以,常久不闻肉味的灶王爷,知道客人要来,自然是喜笑颜开——或许,灶王爷是个吃货也未可知——《古诗十九首》里质朴感人的诗篇,直抵人心,原因在哪里?还是努力加餐饭!

我们常说距离产生美,这里的美是从思念里产生的。君住长江头,我住长江尾,两地相隔,不得相见,便产生了思念——把人放在脑海里,窝在心底里,慢慢把玩,再怎么凶狠的家伙也会被打磨成可爱的艺术品。距离能让人宽

恕一切过错。若是经过漫长岁月,便只剩下脉脉的温情了。在古代,地理上的距离,本身就具备着时间上的维度。千山万水,一个讯息也能走个把月,甚至长达几年。读高中时,有外校的笔友写信过来。一来二往,自然熟络起来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收信是我在学校里的最大期待,而收到信后的欢喜,至今也令我难以忘怀。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诚可信也,在战火纷飞的年月,没有什么比一封报平安的家书更令人期待,更能激荡人心的了。于此可见,古人对自然界里的一些现象极其敏感,也是有其道理。通讯不发达,也只能求助于自然,求助于神。像喜鹊,就是最常见的报喜鸟,谁家门前,树枝上飞来个喜鹊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,便能知道好事近。燕子、杜鹃、花期等等,亦是如此。古人之所以要在这些事物看出个兆头来,其实还是面对着茫茫的人生,心里不安稳。

不过现在不一样了,一个电话就可以嘘寒问暖,一条短信就可以打情骂俏,一个视频就能见面,长胖长瘦,一目了然。距离在科学技术面前,实在是算不上什么。在《生活大爆炸》里,拉杰和霍华德还尝试了一番远距离的体感试验,利用摄像头可以体验与真实相差无几的亲吻。可见,身体的欲望,也能通过高科技来满足,更遑论思念了。比如说,如今乡村里,几乎没有火笑的说法了,为何?因为客人要来拜访,一个电话就能得到确切的消息,早就没必要寄托于灶王爷的“神启”了。所以,即使门前的喜鹊鸣啾不已,也不见得是好事近。顺便提一句,在我们那边,喜鹊是不受待见的,原因是它喜欢聚集在茅干上的墙头,与便溺扯上关系,几乎是摆脱不了肮脏的形象了。再比如说,梧桐花开了又谢,也是平常事,现在很少有人会在花开花落里领悟出什么兆头来。信息流通的加速,

让我们不再把希望寄托于缥缈的事物之上。不过,有时候,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,科学技术的进步,反而使人们的情感变得疏远。我们享受着技术的便捷,情感的感悟力却在逐步减弱——这种情况类似于城市,虽住在楼上楼下,邻里之间却未必感情好,不如乡村那样熟络——距离太短,思念也会变得廉价。太容易得到的情谊,反而不会去珍惜。

对于这点我深有体会:比如说我,有许多朋友之前我们还一直有着联系,到后来生活晃荡,便慢慢地疏远了。虽然心底里还在惦记着他们,虽然现在在各种的聊天工具,有手机电话,但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联系。朋友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不冷不淡挂着,直到有一天彻底地断了联系。所谓知交半零落,莫过于如此。朋友相遇、相见、相知,向来是件荣幸的事情。而今就像杜甫的诗《赠卫八处士》,令人不忍卒读:

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。

卫灵公篇载:子曰:“辞,达而已矣。”辞,包括单词、词组、词句、辞章。达,通达,透彻,明白。

古代有一类学者认为,此语是孔子对邦交而发,引“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”(子路篇),说“辞”即指“专对”之辞。进一步论证,辞达即言辞恰如其分地表达意思。“辞无常,孙而说。辞多则史,少则不达。辞苟足以达,义之至也。”(《仪礼·聘礼》)言辞没有死规定,只需谦逊、和悦。言辞太多,就会过于繁杂;言辞太少,就不能把意思表达清楚。言辞如果足以达意而不泛滥,那才是最高标准。

另一类学者笼统说“辞”,不认可专指邦交之辞;而且,特别强调“达”的实在、准确、明白之义。汉代孔安国说:“凡事莫过于实,辞达则足矣,不烦文艳之辞。”宋代朱熹说:“辞,取达意为止,不以富丽为工。”(《论语集解》)

如今,均从后一类学者,一般译作:“言辞,能够通顺、明白地表达意思就可以了。”言下之意,就是说话、撰文,达意为主,无需修饰,不必富丽,避免冗长。正如晋代陆机所言:“要辞达而理举,故无取乎冗长。”(《文赋》)

孔子的这一主张,并非信口拈来,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。在孔子心目中,“君子欲讷于言”(里仁篇),“仁者其言也讷”(颜渊篇)。讷,切,则必慎重、稳妥、准确、简要。同时,孔子认为“巧言乱德”(卫灵公篇),“巧言令

色,鲜矣仁”(阳货篇)。巧言,或花言巧语,或夸夸其谈,或强辞夺理,必油滑、浮夸、牵强、冗长,混淆是非、善恶。言辞如何,体现道德高下,这是语言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论说,立意高绝,震聋发聩。也就是说,言为心声,具备何种道德水准和修养境界,就会有与之相应的言辞表达。仁者、君子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质朴,要少说多做,言行一致;而说出的话,写出的文,钉是钉,铆是铆。

孔子的话还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从文字语言来讲,则更清楚。殷商甲骨文和商周钟鼎文属于中国文字语言发展的早期,简略是其突出特色。春秋是由简入繁的过渡期,其语言虽远比《尚书》《诗经》为繁,但仍然简约。文字语言的丰富表述,以及广泛传播,到战国才形成第一个高潮。代表人物是孟子、庄子、屈原等人。其时,语言的记事、立意、表情之功能,止于“达”已不足。于是,有了孟子层层推理的大段议论,有了庄子汪洋恣肆的自由挥发,有了屈原辽阔绚烂的尽情抒写。“文艳之辞”“富丽为工”经常成为必要的表达手段。

不过,“辞达”的准确、明白之义,仍是基本原则、核心原则。此原则永远不会变,以此衡量当今某些人的话与文,常感辞不达意,文不对题。最令人头疼者,是部分食洋不化的“海归”,其文曲曲聱牙,难以卒读;以及众多沉溺自我的“网虫”,其文疙疙瘩瘩,不知所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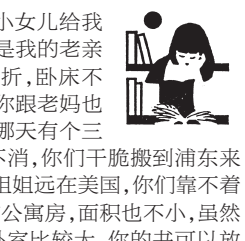
「辞,达而已矣」

白子超



论语新读

不久前,住在浦东的小女儿给我电话,说是她的公公,也就是我的老亲家,不慎摔了一跤,股骨骨折,卧床不起,家中乱成一团。她说,你跟老妈也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,万一哪天有个三长两短,我两面奔跑可吃不消,你们干脆搬到浦东来住吧,你们养老总得靠我,姐姐远在美国,你们靠不着她的,我这里有一套空着的公寓房,面积也不小,虽然没有单独的书房,但是主卧室比较大,你的书可以放在主卧室里,不过你书太多了,至少处理掉一半。她给我俩一年的“缓刑期”,做准备工作,到时必须搬过去。女儿一片孝心,她的吩咐我们老夫妻必须执行。



弃书小记

钱绍昌

于是我就开始弃书了。丢弃哪些书呢?这使我十分为难。我是个读书人,又是个教书先生,书是我的性命。这十年来我的藏书只有不断增加,从来没有减少过。如今它们大难临头了,在劫难逃。

我曾经参观过几个作家的书房,他们的书铺天盖地,老话说是“汗牛充栋”。我虽没有这么多书,但也着实不少,书房里从地板堆到天花板,书桌和电脑桌上也全是书,甚至蔓延到卧室和客厅里。该从哪儿下手呢?

首先考虑的是教科书。我在1948年进了圣约翰,跟老父亲一样学医。数十本教科书全是美国进口的原版书,洋洋数十本,当时书价在50美元以上,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。老爸当年虽不富有,但对5个儿子的教育投资倒是毫不吝啬。这些书浸透着我少年时代的无限心血,是万万不能丢弃的!

接下来是本人的拙作,有原著和译著,水平虽然不高,但敝帚自珍,毕竟是我辛勤地爬格子爬出来的。那就每种留下几本,大部分都给了收旧纸的啦。

然后是友人赠送的书籍,其中有的还是名家,好几位已离开这个世界。书的扉页上均有作者的签名和请我“惠存”、“雅正”、“指正”等热情题字。斯人已去,情谊永存,睹物思人,倍感珍惜。不能丢!

书架上还有大量的医学参考书。我早已弃医从教,这些参考书完全不看了。去吧,去吧。改行教外语后买了许多外文名著,闲时偶尔翻阅解闷。留下吧。搞翻译离不开词典,数十部大词典全得留下。

红楼、水浒、三国、西游等文学名著早已上了多数老板的书架。他们有,我岂能丢?四书五经、史记、古文观止、唐诗宋词、资治通鉴等是中国文化的精华,不可丢。

鲁迅全集当然保留,至于其他作家的文集,对不住,拜拜了。许多闲书是在书店、书店里随手购买的,再见吧,亲爱的。还有堆积如山的杂志,统统处理掉算了。

几个月下来,忍痛割爱了大约一千斤书。收废纸的以每斤三毛钱收下,共计300元!我发财了!

不过现在不一样了,一个电话就可以嘘寒问暖,一条短信就可以打情骂俏,一个视频就能见面,长胖长瘦,一目了然。距离在科学技术面前,实在是算不上什么。在《生活大爆炸》里,拉杰和霍华德还尝试了一番远距离的体感试验,利用摄像头可以体验与真实相差无几的亲吻。可见,身体的欲望,也能通过高科技来满足,更遑论思念了。比如说,如今乡村里,几乎没有火笑的说法了,为何?因为客人要来拜访,一个电话就能得到确切的消息,早就没必要寄托于灶王爷的“神启”了。所以,即使门前的喜鹊鸣啾不已,也不见得是好事近。顺便提一句,在我们那边,喜鹊是不受待见的,原因是它喜欢聚集在茅干上的墙头,与便溺扯上关系,几乎是摆脱不了肮脏的形象了。再比如说,梧桐花开了又谢,也是平常事,现在很少有人会在花开花落里领悟出什么兆头来。信息流通的加速,

让我们不再把希望寄托于缥缈的事物之上。不过,有时候,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,科学技术的进步,反而使人们的情感变得疏远。我们享受着技术的便捷,情感的感悟力却在逐步减弱——这种情况类似于城市,虽住在楼上楼下,邻里之间却未必感情好,不如乡村那样熟络——距离太短,思念也会变得廉价。太容易得到的情谊,反而不会去珍惜。

对于这点我深有体会:比如说我,有许多朋友之前我们还一直有着联系,到后来生活晃荡,便慢慢地疏远了。虽然心底里还在惦记着他们,虽然现在在各种的聊天工具,有手机电话,但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联系。朋友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不冷不淡挂着,直到有一天彻底地断了联系。所谓知交半零落,莫过于如此。朋友相遇、相见、相知,向来是件荣幸的事情。而今就像杜甫的诗《赠卫八处士》,令人不忍卒读:

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。

卫灵公篇载:子曰:“辞,达而已矣。”辞,包括单词、词组、词句、辞章。达,通达,透彻,明白。

古代有一类学者认为,此语是孔子对邦交而发,引“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”(子路篇),说“辞”即指“专对”之辞。进一步论证,辞达即言辞恰如其分地表达意思。“辞无常,孙而说。辞多则史,少则不达。辞苟足以达,义之至也。”(《仪礼·聘礼》)言辞没有死规定,只需谦逊、和悦。言辞太多,就会过于繁杂;言辞太少,就不能把意思表达清楚。言辞如果足以达意而不泛滥,那才是最高标准。

另一类学者笼统说“辞”,不认可专指邦交之辞;而且,特别强调“达”的实在、准确、明白之义。汉代孔安国说:“凡事莫过于实,辞达则足矣,不烦文艳之辞。”宋代朱熹说:“辞,取达意为止,不以富丽为工。”(《论语集解》)

如今,均从后一类学者,一般译作:“言辞,能够通顺、明白地表达意思就可以了。”言下之意,就是说话、撰文,达意为主,无需修饰,不必富丽,避免冗长。正如晋代陆机所言:“要辞达而理举,故无取乎冗长。”(《文赋》)

孔子的这一主张,并非信口拈来,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。在孔子心目中,“君子欲讷于言”(里仁篇),“仁者其言也讷”(颜渊篇)。讷,切,则必慎重、稳妥、准确、简要。同时,孔子认为“巧言乱德”(卫灵公篇),“巧言令

色,鲜矣仁”(阳货篇)。巧言,或花言巧语,或夸夸其谈,或强辞夺理,必油滑、浮夸、牵强、冗长,混淆是非、善恶。言辞如何,体现道德高下,这是语言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论说,立意高绝,震聋发聩。也就是说,言为心声,具备何种道德水准和修养境界,就会有与之相应的言辞表达。仁者、君子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质朴,要少说多做,言行一致;而说出的话,写出的文,钉是钉,铆是铆。

孔子的话还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从文字语言来讲,则更清楚。殷商甲骨文和商周钟鼎文属于中国文字语言发展的早期,简略是其突出特色。春秋是由简入繁的过渡期,其语言虽远比《尚书》《诗经》为繁,但仍然简约。文字语言的丰富表述,以及广泛传播,到战国才形成第一个高潮。代表人物是孟子、庄子、屈原等人。其时,语言的记事、立意、表情之功能,止于“达”已不足。于是,有了孟子层层推理的大段议论,有了庄子汪洋恣肆的自由挥发,有了屈原辽阔绚烂的尽情抒写。“文艳之辞”“富丽为工”经常成为必要的表达手段。

不过,“辞达”的准确、明白之义,仍是基本原则、核心原则。此原则永远不会变,以此衡量当今某些人的话与文,常感辞不达意,文不对题。最令人头疼者,是部分食洋不化的“海归”,其文曲曲聱牙,难以卒读;以及众多沉溺自我的“网虫”,其文疙疙瘩瘩,不知所云。

文化杂咏·端阳

胡中行 诗 文 孙绍波 图

门悬艾叶唱雄黄,苍术烟熏白芷香。
抛却虚无飘渺说,驱除五毒正端阳。

端午本为毒月恶日,古书载:是日五毒并出,宜蓄兰沐浴以驱邪,故民间有插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并喝雄黄酒之习俗。由此知端午实为健康节、卫生节也。至若屈原忧国、曹娥纯孝、子胥冤死,皆附会于此日,而于史无稽。



戒嗔几位师父的爱好略有不同,其中智缘师父比较喜欢养花,他在佛堂前摆放了一个花架子,把自己种的花草放在上面。对于原本简单空旷的寺院来说,有了这花架子,也算多了点儿姿彩。

花架子上的花草品种不少,多数是些寻常的,如月季、仙人掌之类的,也有些不常见的花草,戒嗔也叫不出名字。常常往来于寺庙的施主大多知道智缘师父有这个爱好,所以经常在上山的时候,顺便带上几盆花送给智缘师父。

只是智缘师父虽然喜欢养花,但种植花草的水平很一般。在戒嗔的印象中,智缘师父时常会把一些难养活的花草弄枯萎了。幸好经常有人送,所以花架子上的花也不见少,反而越来越多。

淼镇里有个姓岳的老施主,据说岳施主以前所从事的是和花木有关的工作,退休后,便从城市搬到了镇上来住。岳施主和智缘师父有着相同的爱好,所以两个人很谈得来,当然他种花的水平比智缘师父要高很多。

有次岳老施主给智缘师父带来了一件礼物,是一个小小的花盆,里面种着一枝不起眼的小植物。戒嗔并不认得那是什么花,但是看到智缘师父高兴的样子,感觉应该是盆很稀罕的花。岳老施主告诉戒嗔,这种花是从远方购买的,据说开花的时候非常艳丽,但是这种花非常难养活。岳施主特意拿出一本书,指着中间的几页告诉智缘师父,说是种植这种花的方法。

智缘师父很高兴地收下了书,岳老施主走了后,智缘师父坐在小椅子上,仔细地翻看那本书,把小花放在最容易接受阳光的地方,按着书上所说的种植方法仔细地调配泥土、养料和水。他还在本子上记录了一些浇水施肥的时间,让戒嗔到时候记得提醒他。可惜虽然智缘师父很用心,那盆花养了一个多月后,没有等到开花就枯萎了。智缘师父有些失望,只得把花扔掉了。

后来有一天,戒嗔搬动花架子,意外地在花架最低端发现一盆歪放的仙人掌,那是半个月前就失踪的花,先前戒嗔一直以为是哪位施主喜欢带走了,所以并没有去寻找它,谁知道竟然是掉在夹缝里了。半个月不见阳光,没有水分,仙人掌的叶片也只是略显缺水而已。

戒嗔把仙人掌放回原处,再给它浇上些水,只过了几天,仙人掌便复原从前不过的样子,又翠绿如常了。

精心培养的花儿,不过一个月就枯萎了,而放任半个月没人打理的仙人掌却存活了下来。戒嗔问智缘师父这其中的原因,智缘师父说:因为仙人掌生长在沙漠里,已经习惯了没有水的日子。就算赶上几日找到它,它也未必会枯萎。

戒嗔想:原来困境并不一定完全是坏处,就像生长在沙漠里的仙人掌,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生长,反而因此有了更顽强的生命力。

那么在艰难生活中的我们,是不是也应该时刻告诉自己,我会因此而变得更强大?

奇花与仙人掌

释戒嗔

路政局路网监测中心,十几个屏幕组成一堵阔大的墙,每个屏幕上活动着不同的图形:疾驶着的车,时堵时畅的收费口,字幕提示的某道口异常……十几位工作人员,面对着大屏幕和各自面前的电脑荧屏,通过在全市布设的1735套监控摄像机、近2000台车检器的监测,对道路运行情况进行跟踪分析。这张图,宛如标示的人体大动脉,任何一点都不能堵塞……永远面临着问题,有常见的,也有突发的。路政服务热线12122呼叫中心,日均话务量800余次。你能永远心平气和吗?

王维凤,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博士,一位来自东北森林的70后妈妈,十多年来,先后主持了30余项道路网规划和交通研究工作。王维凤道路规划设计创新工作室,一个拥有7位硕士以上年轻人的年轻团队,承担着全市道路规划、设计、审查的职责。上海寸土寸金,稍微动一动都会牵扯到方方面面,从选线做规划开始,面对的就是最艰难的协调和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。好

些,但又都不愿意垃圾箱放在自家门口。有时候,真想杀出一条血路。“会怕吗?”我问。“不怕,只要不打上来,就笑脸相迎。”常年户外奔波,她的脸庞吸满了阳光,笑容也是那般开朗自信。王维凤本科读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,研究生时改为交通科学与工程,她在那时候就发觉,自己在这方面

“网”情深

孙小琪

的悟性比面对大机器有把握,改行改对了。她说,路是给人走的,人文关怀很重要,真正要以人为本才能做好,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。比如我们提倡绿色环保,现在小汽车多,占地、空气污染、噪音,要改变,就要让大家觉得骑自行车舒服,走路舒服。断头路要对接,道路要通畅,换乘要方便,连接处能有廊道,淋不到雨,人们会愿意走。每一项工程,“环境影响评价”是最难的,只有多为百姓着想,才能换来支持。

上海无处不在的道路是路政局管理的业务,平凡、琐碎,关联着千家万户,影响着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。比如路面下的窨井,上海市650万个井盖,缺损、沉降、凸起、被盗,必须常年维护才能避免意外和悲剧。路政局采取多重措施,为井盖做胶木托盘或尼龙兜,在全市推进井盖托底管理,很有创意。

总长4852公里的城市道路,总里程12945公里的公路,还有1万多座桥梁,几百万辆机动车,全市道路的建设、养护和运行管理就是路政局的使命。路政局职工中有许多先进典型,如几十年扎根基层的十八大代表严林妹,全国百佳模范养护工谢震瑜,G40陈海公路收费站的微笑服务明星陈金贤……机关机构改革,许多处级干部下调了岗位,但干部懂得服从大局,他们的努力在上海的道路上,在风雨中。他们也懂得,唯有尊重劳动者,依靠劳动者的努力,才能一步步实现中国梦。

明刊浦东公交的故事。

行在上海

明刊浦东公交的故事。

